

## 第一章 汉族移民历程考论

清代的“内蒙古”，是一个政治区划概念，特指最先归附清朝的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四十九旗，即所谓的“内扎萨克蒙古”<sup>[1]</sup>。但在习惯上，“内蒙古”通常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总称瀚海以南、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相当于清代的漠南蒙古地方。内蒙古地区除“六盟四十九旗”外，还包括归化城土默特旗两翼、察哈尔八旗、阿拉善厄鲁特一旗、额济纳土尔扈特一旗、呼伦贝尔八旗、黑龙江伊克明安旗等<sup>[2]</sup>，其范围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时还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及蒙古国的一部分。由于这一广大地域全部位于长城（长城古称‘塞’）以北，因而又被称为塞外地区。

塞外草原，历史上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舞台，在蒙古族一统大漠南北之前，匈奴、乌桓、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曾在这里成长和发展过。在秦、汉、唐、辽、元等时期，塞外农业经济也一度有过振兴，但除汉代持续时间较长（200余年）外，大都时兴时废，牧业始终立于主导地位。塞外稳定农区的出现和牧业的明显退缩，发生在清朝定鼎以后。以农为本的汉族移民大举出塞，安家落户，使塞外农业有了坚实依托。民族结构的重要变动带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最终使农业及与农业相伴随的中原文化在塞外取得了与游牧经济及游牧文化相对等的地位。

## 第一节 汉族移民的类型特征与启动机制

在明清以前，内地人口就有过向塞外地区规模移动的历史<sup>[3]</sup>。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将中原地区 3 万户人家迁到内蒙古境内的北河（今乌加河）和榆中（今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等地，进行垦殖。对这部分移民及自愿迁入边地的人，由官府划给耕地和宅地，让他们安居乐业<sup>[4]</sup>。汉武帝时期，经过连年战争，却退匈奴，在阴山以南设置朔方、五原、云中、西河等郡和居延等县，组织大批内地人口前往垦种。前 127 年（元朔二年），西汉迁移内地 10 万农民“给卫朔方”。前 111 年（元鼎六年），又在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等郡开官田，安置 60 万人进行耕作。可见，西汉向塞外地区的移民规模是很大的。经过移民开垦，今天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成了西汉重要的农业区，呈现出“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富饶景象<sup>[5]</sup>。西汉以后，这样大规模的塞外移民再未出现过。直到明朝立国，在漠南地区设卫所，屯田养兵，军事移垦一度复兴，但规模有限，不少卫所仍得靠内地调粮接济。另外，为时也很短暂，到永乐初，卫所陆续内迁，军屯仅 30 余年就宣布告废。从明代开始，倒是非官方的自发移民逐渐发育起来，并成长为塞外移民的主流。

明代晋、陕之民出塞定居，为数不少<sup>[6]</sup>。但由于战争时起，边门启闭无常，即使在隆庆议和（1571 年）后，明朝边塞兵备未减，对出塞人口实行严格管制。在这种情况下，较为稳定的移民流难以形成。在移民的构成上，兵变戍卒、逃亡者、俘虏等非正常人口占有很大比例。嘉靖初年，大同镇发生严重兵变事件，卫戍兵卒纷纷逃往边外俺答汗部。“初，大同之变诸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sup>[7]</sup>”。明代出塞汉人的一个重要群体是白莲教教徒。白莲教是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反抗官府压迫的重要工具，在晋陕地区和边塞卒中有很大影响。大同兵变就是由白莲教徒组织发动的，他们在举



图 1-1 清初内蒙古地区各盟旗分布示意图

据《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清代蒙古族分布示意图”改绘

事失败后,严遭官方追捕,相率逃亡北去。像为俺答汗所器重的汉人领袖丘富、赵全、李自馨、周原、刘天祺、张彦文等,都是白莲教的骨干分子或者是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的人,身份多半是大同镇的下级军官和戍卒<sup>[8]</sup>。据统计,从嘉靖初年到隆庆议和的 20 多年时间里,迁移到土默特川的内地汉人总计有 50 000 余人,其中白莲教徒就有 10 000 人左右<sup>[9]</sup>。在移民方式上,这一时期采取的多是入塞掳掠、集体叛逃、招引旧部、策动诱惑等非常手段。“岁掠华人以千万计”;“虏帅五十骑到堡,索我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是时,丘富说俺答,收奇伟倜傥士”等史料记载都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因政治分隔而造成的独特移民景观<sup>[10]</sup>。因此,明代可以被视为塞外移民的前奏。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塞外移民主要集中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在这三百余年当中,移民过程基本是连续进行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迁移方式、迁移路线和移民文化,构成这一时期北方移民运动的重

要板块。清朝政治统一，结束了塞内外分隔的状态。尽管清朝长期推行蒙汉分离政策，但属于一个政治体系内的分隔，与明代两个政治体系对立下的封闭隔离有明显不同。首先，出塞移民的政治定性有了根本改变，两个政治实体分立背景下的叛逃、掳掠、招纳等特有政治解释已成明日黄花。清朝把违禁移民普遍作为“私自出边”、“私招私垦”等体制内问题对待，视其为“越规者”而不是“叛逃者”。对自明代开始的整个塞外移民来说，这称得上是第一次政治解禁，内地人口出塞程序由此正常化，步入民间和平移居的轨道。其次，在清代，随着版图的扩大，北部边防重心由长城而一举远推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外兴安岭一线。清朝提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sup>[11]</sup>。长城烽烟不再，撤亭罢障，兵力大减，“在昔称为长城万里之险者，在今视为荒壁土墙而已”<sup>[12]</sup>。久而久之，“废堙颓垣，渐且夷为道路，后人忘其为边也，百余年矣”<sup>[13]</sup>。1864年（同治三年）有大臣奏称：“长城坍塌处所不少，单骑独行，易于偷越，巡察尤难”<sup>[14]</sup>。边不备警，出塞者即可越墙疾走。第三，清朝对汉人出塞总体上以禁为主，但迫于内地人口压力和灾害威胁，又不时主动开禁；另外只禁蒙地不禁旗地（清代塞外有不少由清廷直辖的旗地），并且对于已经迁入的汉人采取承认主义，不予追究，这表明禁令下的移民空间还是很大的。第四，清末蒙地全面开放是对塞外移民的第二次政治解禁，塞外移民从此完全合法化，推动了后续移民的进行。

## 一、汉族移民的类型特征

塞外汉族移民横越三百余年，在万里长城一线，呈全线迁移之势，历时之久，涉地之广，在中国近代移民史上独一无二。在如此宏阔的时空领域中，移民过程的复杂性、分散性和移民社会发育的不平衡性十分显著。因此，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归类判断，不失为建立塞外移民宏观印象的一个有益切入点。

移民类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指标，根据不同的要求，可

以进行多重划分，其中原因与方式是最主要的两个分类依据。按照移民的原因，可分为推动型移民和拉动型移民两个类型；按照移民的方式，又可分为自发性移民与组织移民两个类型。这两种划分方法，四个基本类型基本涵盖了历史移民的主要形态。推动型移民强调的是移出区立身艰难，谋生不易，被迫向外迁移，重新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移居主要是想摆脱困境，不求富但求活。拉动型是指移入区条件优越，有吸引力，移民“择良地而栖”，主动向外搬迁，移居主要是为求得比以前更好的生活环境或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在预期层级上较前者高。向城市迁移、向发达地区迁移，就是典型的拉动型移民。

### 1. 主导类型——推动型移民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强调宗亲乡土观念的国度里，农民是安土重迁的。他们就像黏着在土地上似的，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离乡他适的。“我们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sup>[15]</sup>。“父母在，不远游”，就是对这种乡土情结的简捷表达。因此，移民往往是被迫的，移民同时也就是逃荒的饥民和逃难的难民，这种推动性移民在解放前具有普遍性，塞外移民也不例外。1893年，在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的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接触到大量来自内地的移民。他认为，“最先来自中原地区的这种移民或者是贫穷苦命的人；或者是无依无靠而又不守本分、希冀闯江湖发横财的光棍；此外还有在本乡本土不能立足，有亲戚不能投靠，甚至于不见容于家庭的十足的无赖”<sup>[16]</sup>。这一概括基本是准确的，塞外移民中也有富商、资本家、教书匠，但数量很少，并且出现的时间也较晚，贫民、饥民与游民一直是塞外移民的主体。民国时期的武川县移民，“惟来者都为生计压迫至此，故富户绝少”<sup>[17]</sup>。这种情形在内蒙各地十分普遍。灾荒移民、战乱移民、贫困移民是推动型移民的三个主要亚型，这三者塞外移民兼而有之。

(1) 灾荒移民 在中国移民史上，灾荒是最主要的移民原因，灾荒移民不仅发生频率最高，规模也最大。就数量较大的塞外移民

个案来说，几乎全都是由内地饥荒引起的。明代出塞移民，许多就是“因饥馑困饿”而去<sup>[18]</sup>。1746年巡视归化城等地的清廷官员也报告说：“上年口内欠收，贫民就食归化，无力回籍”<sup>[19]</sup>。1913年1月，参加西盟会议的勺輿在归化城遇到大批从山东、江北一带逃来的难民，“扶老携幼，何啻数百，狼藉之态，惨不忍睹”<sup>[20]</sup>。

内地大饥荒激起塞外大移民，几乎成了不变的定律。雍正初年的“借地养民”是塞外移民前期的一个高峰。这个峰值就是由内地水灾引起的。1723年（雍正元年）1724年（雍正二年）两年，直隶、山东一带连遭饥馑，灾民大批涌入京师及边口地方。为解决灾民度荒问题，雍正允准内地乏食民人可前往口外垦地谋生。清廷规定，“乐于就移”者，“免其田赋”，同时谕令各旗蒙古王公容留灾民“特许其吃租”，此即所谓的“一地养二民”，蒙古族称为“借地养民”<sup>[21]</sup>。在借地养民令的鼓励下，直隶、山东一带饥民滔滔涌向近边的卓索图、昭乌达盟等地，掀起了一次移民高潮。1743年（乾隆八年），直隶一带再遭大祸，饥民成群结队地向口外涌来，“天津、河间等处较早，闻得两府所属失业流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为应对危机，清廷网开一面，密令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守关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sup>[22]</sup>，又出现了一个移民高潮。

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连续两年，发生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旱灾，被及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四省，而以陕西、山西受害尤烈。“据报告，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部分地区寸雨未下”<sup>[23]</sup>。山西很多村庄，居民不是全家饿死，就是一户所剩无几，甚至有“尽村无遗者”。这次大灾，山西省“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sup>[24]</sup>。北方各省同时受灾，相互之间的调剂已无可能，口外也是被灾区，但后套一带幸免于难，成为灾民的投奔目标，掀起晚清一次较大的塞外移民潮。1918年，

的地理、边防、物产、民族等实情，以求固边御侮之策。清末民初之际问世的姚明辉《蒙古志》、卓宏谋《蒙古鉴》、花楞《内蒙古纪要》和王士仁《哲盟实剂》等个人著作都涉及蒙古地区的汉族。就民国时期内蒙古的汉族移民研究而言，实际上归结为“移民实边”这一个主题。移垦实边一类的文论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很盛行，如刘仲仁《开辟蒙荒议》（1916年）、彭家元《中国边地之概念与移民实边》（1925年）孟广照《热察蒙之移民问题》（1931年）等等。对于“移民实边”论的高唱入云，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和反问，其中以白月恒《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地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12年）一文最具深度。白月恒反对盲目移民开垦，主张在蒙古地区因地制宜地走林牧之路，代表了时人对蒙地开垦认识的一个新高度。民国时期，专门研究内蒙古汉族移民本身的文论很少，没有出现像朱倝《满洲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期，1928年）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第2期，1941年）等那样一批研究东北移民的宏篇大论。S. C君《热河卓昭两盟垦殖演进之研究》（《蒙藏周报》第63~68期，1931年）和边衡《晋绥关系及其蒙旗政策》（《蒙藏旬刊》第115~116期）分别对汉族移民向卓、昭两盟迁居的过程和绥远的山西移民进行了研究，是关于塞外汉族移民的两篇代表性论文。1933年，由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生，内蒙古再度成为国人关注的目标。方范九的《蒙古概况与内蒙古自治运动》（1934年）黄奋生的《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1935年）谭锡吾的《内蒙古之今昔》（1935年）贺扬灵的《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1935年）等一批著作正是在此背景下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触及内蒙古地区的汉农蒙牧关系和其他深层社会问题。《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收有大量关于蒙汉人口及经济生活状况的数据资料，学术价值颇高。同一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术团体对内外蒙古地区也给予高度关注，在各自所办刊物上纷纷开辟专辑，组织相关专家集中研

旗的一个蒙古小寒村，仅有十来户牧民居住。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辽沈长春避难人，多往归之，遽成大村落”<sup>[30]</sup>。同一时期，民国模范省——山西省，由于阎锡山推行“保境安民”政策，社会较为安定，战乱移民输出不多。甘肃、宁夏，民国时期战事不断，沿边汉人把贺兰山内的阿拉善旗当成避难所。“独西套阿拉善旗，以四境交通不便，耸峰障，境内盗匪绝迹，民殷物阜，颇有上古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之风，咸视该地为世外桃源，争赴阿旗谋生”<sup>[31]</sup>。定远营、窑坝、头道河、二道河等地为甘宁逃难汉族的主要聚居点。

(3) 贫困移民 因生活困难、谋食不易而移民，是正常年份塞外移民的主要形态。塞外移民的迁出区大多是地瘠民贫之地、人多地少之乡。晋北、陕北是内蒙西部的的主要移民源，这里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干旱少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山西宁武府四县（宁武、偏关、神池、五寨）“地瘠而少田，田多在山上，农人岁耕所获盖少，又无桑柘麻枲，故其人艰于衣食。……执工技者或作为弓矢马鞍，运之归化、绥远诸城，鬻艺于军营；或无地以耕，亦多佃塞外”<sup>[32]</sup>。偏关县在明朝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到清代由于兵将裁汰，市易顿衰，逐利日难，“故关民多有出口谋生，从此寄籍他所，不再回里者”<sup>[33]</sup>。大同府，“地土沙碛薄，风高气寒，丰岁亩不满斗，中人日仅再食”<sup>[34]</sup>，人们为谋生不得不迁居塞外。忻定盆地，“是一片平原，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但这些好地早为地主占有，地价很高，一般人民根本买不起，也往内蒙古迁移<sup>[35]</sup>。陕北怀远县（民国改横山县），境内“多沙碛高阜，可耕地甚少”，“地有开垦而粮无加增，境内无地可耕者皆租蒙古地亩”<sup>[36]</sup>。甘肃民勤县（原名镇番县）“十地九沙”<sup>[37]</sup>，民勤于地而地出无多，有长期向外移民的传统，故有“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阿拉善旗、河套及新疆一带是民勤人的主要迁移方向。1937年，就有1600多民勤妇女和小孩流入阿拉善旗定远营，“彼等在

乡不能谋生，因多逃来此地”<sup>[38]</sup>。山东人多地少的问题早在清初就已显露。1712（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就发现“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sup>[39]</sup>。山东荣成县“地瘠民贫，百倍勤劳，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他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sup>[40]</sup>。

## 2. 拉动型移民的上升

推动型是塞外移民的主导类型。但随着移民周期的延长，推动型又有向拉动型转化的趋势，这是移民史上常见的现象。刚开始，内地人对塞外的情况不甚了解，知道的就是古诗里描写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等等。一提起塞外朔漠，眼前顿时浮现出一片天寒地冻、风沙弥漫的苦涩景象，闻者裹足，望者却步。等真正到了塞外后，发现这里蓝天白云，青草无边，牛羊成群，土地宽广，条件比家乡还要好。先行移民带回的真实信息，逐渐改变了内地人对塞外的印象，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移民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踩路效应”。这时候，内地汉人不唯灾歉之年走口外，即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对塞外也照样趋之若鹜。“直隶之民，虽当丰收之年，亦多出关、出口谋生”<sup>[41]</sup>。嘉庆、道光年间，内地移民携眷出关者增多，即使丰稔之年，仍有“数百余户”出关定居<sup>[42]</sup>。这种移民队伍渐趋稳定的状况折射出移民运动已形成惯性，开始抛开内地因素的干扰，而主要受动于塞外移入区的恒久吸引力，标志着拉动型移民的成熟。塞内土地紧张，收成丰歉不均，捐税繁多沉重，人们很难建立起对生活的可靠预期。塞外虽然不保年年有余，但回旋余地大，移民个人选择的自由度也大，加上蒙旗地租轻薄，人们对此间的生活要比对内地有信心。在移民的心目中，渐渐地形成了“内地不如塞外”的认识，这种观念一旦确立，就成为刺激移民北迁的持续拉动力。

蒙旗草地，有机质蕴含丰富，开垦即成沃壤。“千载荒芜，蒙人游牧其间，腐草畜矢，堆置遍野，一经垦辟，盖不难尽成沃壤也”<sup>[43]</sup>。因此，新开草地，地力十分强劲。“武川为数千年之牧场，

肥料遗留极多，土地肥美。初年开垦，养分过足，小麦不能栽培，种植燕麦、菜子始能收获，可续种二十年，无庸施肥”<sup>[44]</sup>。土地肥沃，如得水源灌溉，庄稼长势更是旺盛得出奇。乌兰花（四子王旗境）以东的笔架山山麓，有河流一道，清水潺潺，终年不绝。“农人开渠灌溉，燕麦生长之茂，马入不能见其背，每亩产量在一石以上”<sup>[45]</sup>。康熙也曾说：“朕数年避暑塞外，令开垦种植，见禾苗有高七尺，穗长一尺五寸者。……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至一石，若边外之田，所获更倍之”<sup>[46]</sup>。土肥水美，农夫稍事耕作即可丰收在望。对需要买地的内地人来说，塞外地价甚贱。如察哈尔左翼一带，“至垦其地者，初领地时，地价极贱，亩按三百六十弓计算，需银只五钱，垦时约费银六钱左右，本年除本即可得盈余。至一二年后，即可大获其利”<sup>[47]</sup>。另外，汉族移民的经济负担也较轻，只向蒙旗交租，不向国家纳赋。塔子沟厅（厅治在喀喇沁左旗），佃民交租而无赋，惟出易时取斗税耳”<sup>[48]</sup>。这样，在初期移民者的眼里，蒙旗草地俨然就是塞外乐郊、世外桃源。东蒙郭尔罗斯后旗土尔谷屯一带垦民，“各耕地甚多，所蓄牡牝牲口，天暖则垦地，寒则拉车赴对青山出售粮石。耕不费工而田亩又无尽藏，有力即拓而至他，熙熙然世外桃源也”<sup>[49]</sup>。民国初年，到郭尔罗斯后旗考察的孟森就听一个山东车夫说，“此间易谋生，不能复归故土”<sup>[50]</sup>。“此间乐，不思蜀”，代表了出塞得意者的普遍心境。这种对移入新区的由衷满足，加快了对塞外家园的认同过程，缩短了由“雁行”转入定居过渡间隔。

晋西北、陕北移民，总体上受到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压力推挤，但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移民初期，出塞并不是缺田少地过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因为边外地好水好，条件较口内优越，他们宁愿放弃家乡里的次等地而去种边外的上等田。山西河曲人渡河出塞，是因为“边外平田（即‘河西草地’）得资灌溉，芾麻榆柳之利，胜于山乡”<sup>[51]</sup>。时人作《重到西草地》来形容边外开垦后的情景：“莫嫌草地最荒凉，亦便农民亦利商，山洞重重排兔窟，溪流

曲曲绕羊肠。市临云水通中外，界至风沙判黑黄... ..”<sup>[52]</sup>。因此，尽管这里“例不准汉人开垦，利之所在，民尽趋之，边民私向蒙古人佃耕者多致富饶”<sup>[53]</sup>。陕蒙边界的伙盘地，“经农民垦殖，多属膏腴，且能引灌溉，为绥远西南最佳之地”<sup>[54]</sup>，吸引陕北各县农民前来耕垦。靖边县的饶沃地方几乎全在长城以外，“由石渡口至小滩子，万木葱郁，为龙（龙州）、靖（镇靖）两堡旺村。由红柳塘西北至梁镇，东南至西涧、长涧，地更腴沃，西三堡民人争利之”<sup>[55]</sup>。1880年（光绪六年），靖边县清理因战乱造成的“有主无据地”时，无人愿意领照<sup>[56]</sup>。原因是“盖五堡均连蒙古伙盘，地多宽平，租更轻减，民间乐彼厌此，所以往年偶有业主后回者，如肯承粮则垦户情愿分还其地”<sup>[57]</sup>。定边县“素称瘠缺，精华半在边外。口内万山丛聚，户口寥落，居民向藉出口耕牧贸易生活”<sup>[58]</sup>。

### 3. 主流方式——自发性移民

自发性移民是相对于政府移民、社团移民等组织性移民而言，其主要特点：一是任意性强，迁移的时间、人数、定居与否等都由迁移者个人决定，纯属个人行为；二是迁移周期长，移民路上往往是三三两两，走走停停，加上囊资匮乏，置产不易，十年、几十年可能还移不出一个像样的村庄来；三是无明确移居目标，随处漂泊，走到哪里算哪里，用塞外移民唱的“山曲”来说，就是“十月的沙蓬无根草，哪儿挂住哪儿好”<sup>[59]</sup>。波兹德涅耶夫在从滦平到多伦的路上就见到8户这样漫无目标迁移的山东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因为老家土地不够才往蒙古迁移的，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他们将在什么地方住下来”<sup>[60]</sup>。可见，内地汉族对于到塞外那个地方去，是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蒙古有的是地”，以为一出长城，就可以驻足安身。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近边的土地早被先来者占据了，所以这家山东人向波兹德涅耶夫抱怨说，“他们想不到出了长城还要走这么多路”<sup>[61]</sup>。

组织性移民则克服了以上不足，它由政府、社团等机构动用方资源和民间力量专门进行，对于队伍组建、地点选定、时间安

排、经费来源、新居建设等每个环节，都有明确计划和前期准备，并以行政命令和内部纪律相约束，使移民活动有条不紊地展开，移民的效率与质量均胜过自发性移民。民国时期发起社团移民的朱霁青曾指出，移民要成功，必需集团化，“庶几组织严密，力量雄厚”，方可成功<sup>[62]</sup>。

自发性移民一直是塞外移民的主流，贯通于塞外移民的全程。即使在清末及民国前期集中放垦阶段，由政府组织的移民行动也规模有限。这一点与清代东北移民、台湾移民相似，而与当时在新疆、甘肃河西走廊等地的官方屯田移民不同。民国时期，官方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局外号召者，所提供的也主要是减免车船票价、减收地价、延长升科年限等政策性支持，远未投入到移民队伍的选择、移民经费的筹措、移民地点的规划等执行过程中来，移民的具体流程仍然由自发移民方式来解决，这种移民可以称之为官方政策引导下的民间自发移居。

清代塞外土地，有旗地与蒙地之分。自发性移民的主流地位主要是针对广大蒙地而言的。由于清代长期封禁蒙地，在蒙旗领地进行组织移民无从谈起。但蒙旗报效给清廷的旗地，则不受禁令限制，清廷在此设立官庄、皇庄，招徕移民，就属于一种组织移民行为。另外，清廷还在土默特、察哈尔等直辖蒙旗，划设庄头地、大粮地、牧场地等官地，组织移民垦种，也是一种组织移民。归化城“庄头地当即由清王朝招徕汉族农民耕种，直到今天呼和浩特还有庄头地上的丁、胡、李等姓汉人的后裔”<sup>[63]</sup>。再如 1765 年（乾隆三十年），太仆寺牧场由丰镇东北一带迁走，牧地空出，经直隶总督等奏请招民开垦，共放地 23 300 顷<sup>[64]</sup>。但总的来说，在清末放垦前，这种由官方组织的移垦是很有限的。民国时期，由民间社团发起的塞外移民活动日趋活跃，他们筹办各种形式的农垦公司、农牧公司，大片包揽土地，招民开垦，实行企业化经营。同时，由民间人士发起的救济移民、新村移民等也蔚然成风，特别是在绥西地区掀起了一股边疆移民热潮。

## 二、旅蒙商与移民的启动

对移民者个人来说，荒歉乏食只使他们具有了移民的动机，至于迁移能否成行，还取决于移入区是否具备及对其知晓的程度。这里就涉及移民距离远近的问题。一般来说，人们都原意就近迁移，地近人熟，迁居最有把握。但就近移民每每遭遇“撞车”，需要移民的地方正好碰上准备移民的四邻，近处无法容纳，只得移向远方，动辄跨省越州，乃至漂洋过海。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是从熟知的地方向陌生的地方流动。在移居之前，人们很难获取对移入地的亲身感受，只是听别人说有个某某地方才前去的，或者是跟着别人去的，即“模仿移民”。这样，消息传递者和探路者便成了移民运动启动时最关键的人物。在中外移民史上，远游商、航海家、淘金者、传教士等许多群体都扮演过这种“向导”和“榜样”的角色。这类人大多具有冒险精神，例如，美洲移民就是被哥伦布等一批冒险环球航行家拉开序幕的，台湾移民大潮则为一些冒险出海打鱼的闽南渔夫所开启。

塞外移民情况较为复杂，由于有一条很长的边界与冀晋陕甘四省相接，就近移民十分发达，内蒙古中西部的主体移民就来自这四省的北部州县。基于信息自身的传播性，关于塞外移民的消息，便以沿边州县为核心，一波一波、一层一层地向南边的腹地州县辐射，使移民圈越来越大。但这只是启动移民的一条渐进渠道或常规途径。实际上，塞外移民并不完全是由北到南逐次展开的，沿边与腹地也可齐头并进。这种“跳跃式”迁移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由波层网传来信息和仿效模型之前，本地“向导”已先声夺人，接通了出塞路径。旅蒙商就担当了塞外移民的这种“向导”角色。

旅蒙商，“在清代特指来自内地各省，专门或主要从事蒙旗地区商业贸易活动的汉族行商”<sup>[65]</sup>。旅蒙商的主角是“山西商人”。山西商人起于明代的“边商”。明代为解决大批边塞驻军的给养问题，推行“招商中盐，以备边储”的办法，即“开中法”。商人从

中原各地运输粮食至边镇粮仓储备，即可取得一定数量的贩盐凭证（即“盐引”）凭盐引就能到产盐地购得食盐，贩卖取利<sup>[66]</sup>。山西商人由此累资巨万者不在少数，富埒王侯，声震朝野。明朝正统年间大同等处的蒙汉马市开通后，山西商人再次因利乘便，独领风骚。经过明代的先行积累，到清初，山西商人的资本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特别是在蒙汉民族贸易方面，更是独具优势，得以主宰塞外蒙旗市场近三百年。

旅蒙商终年奔波在蒙古高原上，习蒙语，谙蒙情，发挥了“通事”的重要功能。通事是民族接触的中介。“两相异且不相涉之文化初接触时，必需若干兼识双方风格、语言之人，代为沟通、传达，此‘通事’之所由兴也”<sup>[67]</sup>。清代台湾移民中，通晓平埔族语言的汉族通事，在促成汉族与平埔族的租佃关系上起了重要作用。旅蒙商在塞内外往来穿梭，起到了广告媒介作用，让更多的家乡父老了解到塞外地广人稀的地利情况。不少旅蒙商在塞外定居下来后，还从家乡搬移亲族、招徕乡党，使以旅蒙商为龙头的移民群不断扩大。山西、陕西许多移民输出县份都呈农民商人并进之势。如山西保德、河曲两县及陕西神木、府谷、榆林三县，既是绥远河套移民主源地，也是旅蒙商的重要源地。保德县“人民贸易蒙古者甚众”<sup>[68]</sup>。榆林县“人民所赖以生活者，全恃边客贩卖内蒙生产皮毛为命脉，可过之家，大半为旅蒙经商者”<sup>[69]</sup>。大同、忻州、代县是旅蒙商的大本营，同时也是向土默特川和察哈尔右翼移民最多的地区。对于塞外城镇来说，旅蒙商还构成移民的主体。1749年（乾隆十四年）有地方官员报告，“内地人持货赴边，日积月累，迄今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sup>[70]</sup>。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旅蒙商。

在塞外各省移民中，山西人的辐射范围是最大的，东至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昌图府<sup>[71]</sup>，西至阿拉善，甚至北至外蒙库伦以北的图拉河平野，都有一定数量的山西人分布。据1918年北京政府蒙藏院调查，库伦北路垦地共计1353余顷，住户140户，其

中农户 93 户，商号 47 户，人口共计 1 740 人，全系内地人<sup>[72]</sup>。根据山西人在库伦占据压倒多数的情况，这些内地人基本上又是山西人。山西移民遍布塞外各地，正是缘于山西商人足迹遍及塞外各地。阿拉善旗与山西平挂黄河“几”字形两旁，地域分隔，但该旗的汉族移民就有从山西平遥、孝义、汾城等地迁来的，而且移入时间较早。据 1955 年调查，山西籍农户有 10 余户，数目仅次于甘肃、宁夏两地<sup>[73]</sup>。这种远距离移民的产生，是因为山西平遥商人很早就来到阿拉善，接通了远距离移民线路。阿拉善旗最大的商号——祥泰隆，即为平遥商人开办，故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即巴彦浩特，阿拉善旗王府所在地）”的说法，反映出山西商人与山西移民的密切对应关系。

晚清民国时期，后套地区河北邢台移民群的兴起，具体说明了旅蒙商对跨区移民的启动作用。邢台与避居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的后套平原，不但相隔一个山西省，还相隔整整一个土默特川，因此，邢台人越省跨区，千里迢迢迁往后套，实属“有缘千里来相会”，而邢台的旅蒙商就是两地遥相结缘的“红娘”。

邢台旧称顺德，县境西为太行山余脉，山地面积约占全县面积的 3/5，耕地面积少，据 1926 年调查，人均耕地不足 3 亩。在“仅恃农业决不足以为养”的情况下，西部山区人（简称“西山人”或“西乡人”）大都兼营商业。“每年秋收完毕后，有牲畜之家，多驮运各种山货往县城出售。否则替人驮脚，亦足以糊口。无牲畜者，则以肩挑运售<sup>[74]</sup>。邢台最有名的商业——皮毛业，就是由西乡人支撑起来的。“邢台商工业以皮毛业为最盛，出入口货悉赖此为转移，其盛况虽不敌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处，而在直隶各县中要占第一位<sup>[75]</sup>。邢台皮毛业集贩运、经销、加工于一体，皮毛概由贩子从山西、绥远、陕甘一带贩运而来。“此种贩子往来均取道山僻小路，通常由邢台经山西和顺、榆次、太原分赴各处。每年七八月间首途，至十冬月归家，或年底出发至翌年正二月归家<sup>[76]</sup>。邢台人通往塞外蒙地的道路，正是由这些皮毛贩子走出来的。再说

得细微些，邢台人迁居河套地区，主要是由“塞上闻人”王同春带动起来的。

王同春（1851—1925 年）是邢台石门村（县城西 20 里）人，他家在当地皮毛业中很有影响。“先是石门村王姓，有在顺德以制鞍鞞鞭辔为业者，经营颇好，以是王姓族人，每多精于此术”<sup>[77]</sup>。王同春年幼时，王氏一族已家道中落，族祖王成，“以家计困难，无以自给，遂至宁夏之磴口，及包头西南之西山咀子等处，制作车马用具，以与蒙人相交易”。王同春八九岁时，随族叔投寄王成家，从此便与河套地区结下不解之缘。王同春在河套以兴修水利而著名，数十年内，在后套主持兴建大小渠道数百条，垦殖良田百万亩，建立起方圆数百里的庞大庄园，由“开渠大王”成为名噪一时的“后套王”。王同春扬名塞外后，前往后套投奔他的邢台人越来越多。1936 年，据五原当地人介绍，“此地商人，河北占十分之六，山西占十分之四，农民来去无定，晋鲁豫冀各省均有，但以晋冀为最多，约占十分之七八。河北省尤以冀南一带为最多，以开辟河套之王同春即系冀南人故也”<sup>[78]</sup>。除这些春去冬回的“雁行人”外，定居下来的邢台人也不少。如临河县城南有个赵家寡妇村，“赵妇原籍河北邢台人，幼年随其夫来后套开发，后其夫死，赵妇独自经营，现置田甚广，家中畜养牛羊骡马甚多”<sup>[79]</sup>。

在牵引塞外移民潮方面，旅蒙商是主要力量，但不是惟一引导途径。清初的西北用兵和东北抗俄之役，大批内地军队深入蒙地，客观上也起了促进作用。清代康熙朝的平定准噶尔战争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有推动作用。“自康熙西征设驿于杀虎口，由归化城西抵包头镇，北出狼山，固所以便军旅也。而秦晋贫民相与负耒牵车，窃循驿程以俱进”<sup>[80]</sup>。而东蒙移垦则与康熙朝的抗俄战争有关。“闻边墙内外蒙古之地，土地肥沃，以康熙年间征露役后，汉人渐渐侵入此地，从事垦土”<sup>[81]</sup>。

## 第二节 17—19 世纪的移民潮流

汉族移民进入蒙地的次序，基本上是越长城由南向北次第推进。与长城接续的地方，出入交通便利，“风气感染亦速”，移民起步最早<sup>[82]</sup>。“其趋向，一是由长城沿边渐次向北推进；一是从东三省越过柳条边墙向西推进，进入哲里木盟。从时间上来说，前一路线较之后一路线早将近一百年”<sup>[83]</sup>。紧缘长城的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南缘、察哈尔南部及卓索图盟是汉族移民最先进入的地区。

### 一、归化城土默特

归化城土默特旗与卓索图盟是清代最先开垦的地区。从绝对时间上讲，土默特又较卓盟为早。在明代，就有汉人在这里种地。16世纪末，丰州滩一带的汉人已达10万人之多<sup>[84]</sup>。据说，清初编定的归化城土默特60个苏木中，就包括不少出塞汉人在内<sup>[85]</sup>。正因为汉族农民移入的时间早，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也较早。日本学者安斋库治指出，“在土默特地区，封建农奴制化的过程早于内蒙古其他部分而从明代就已经开始，土地的封建所有制也随之有了发展”<sup>[86]</sup>。

土默特蒙古系带地投诚，所居土地被认为是清朝“赏还之地”，清廷对其有直接处置权。平定准噶尔战争开始后，军粮筹措已成为西北用兵的当务之急，“边外积谷，甚属紧要”<sup>[87]</sup>。为接济军需，康熙时期，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设立13处粮庄（即庄头地）招民垦种。1733年（雍正十一年），方观承随清军西行，沿途看到，“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此路军粮，岁取给于此，无挽输之劳”<sup>[88]</sup>。雍乾之交，平准战线虽已大大西移，但归化城的军事防御和军粮供应地位没有下降。为此，1735年（雍正十三年），“归化城都统丹津、协办尚书通智等